

思想史與近代史研究： 英語世界的若干新趨勢*

傅 揚**

摘 要

本文整理英語學界的思想史研究實踐和方法反思，捕捉若干值得重視的近期動態，包括全球思想史、知性實踐的文化史，以及借重數位人文學工具的思想史研究，並簡述這些成果為理解近現代歷史所帶來的貢獻。本文最後亦簡要引介漢語學界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新進展，認為相關討論可以與英語世界的新趨勢互相發明，深具對話潛力。

關鍵詞：思想史、全球史、文化史、知性實踐、數位人文學

* 收稿日期：2017年8月1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1月29日。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特約研究學者

一、引言

無論在英語、法語、德語或漢語學術圈，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都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僅以英語學界論，已有相當大量著述在探討什麼是思想史、如何研究思想史、以及思想史與歷史學其他領域的關係。近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部出版於 2016 年的著作。一部是 Richard Whatmore 撰寫的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由一般習稱的「劍橋學派」（the Cambridge School）立場出發，以重建思想觀念的脈絡為依歸（contextualism），扼要回顧並展望思想史的特質、學術流變、方法、實踐與重要性。¹另一部是 Richard Whatmore 和 Brian Young 主編的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本書從取徑、學科互動和研究實踐三方面綜述思想史의 各種面向，共收錄 29 篇文章。²結合這一大一小的兩部書，讀者應可對英美學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有一大致認識。

當然，界定思想史研究範圍仍是無可逃避的任務。任何相關嘗試，其實都反映界定者關於什麼是「理想」思想史寫作的立場。在此我想徵引的是已故思想史家 John Burrow（1935-2009）的觀點。在一篇綜論自己經驗和反思的文章中，Burrow 認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和「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都是有效的詞彙，相當程度上可以互通，其目標是探究過去人們的反思生活，考察他們關於自身和世界、過去和未來的種種假定、論點、探詢和涵詠，以及進行上述行為所使用的不同詞彙與辭令。Burrow 進而指出，他偏好「思想史」一詞，因為這和「政治史」、「經濟史」類似，反映他致意的是人類活動的特

¹ Richard Whatmore,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²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6).

定形式（即思想、知性活動），而非歷史上出現的抽象範疇。³上述觀點應可反映近數十年英美思想史家的主要關懷，也是本文對思想史內涵的基本理解。

更進一步說，思想史研究有幾個核心關懷。首先，思想史家肯定觀念、思想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其次，思想史家將觀念、學說、思想視為人類活動的一種面向，強調應在歷史時空中加以檢視，盡可能還原古人思想活動的細節、脈絡和意圖。最後，除了上述目標，思想史家也嘗試透過撰述，減少我們考慮過去時的目的論和時代錯置（anachronism）傾向。

從二十世紀上半迄今，英語學界的思想史研究有其榮景和低潮，發展過程中遭遇許多大浪與暗流，但可以肯定的是，思想史研究積累的無數成果，已豐富甚而翻轉許多關於過去的理解，未來也將持續為歷史學做出重要貢獻。⁴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行將結束，思想史研究有何可觀的發展或可能趨勢？本文整理英語學界若干研究實踐和方法反思，捕捉三個值得重視的近期動態，即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知性實踐（intellectual practices，或譯作智識實踐）的文化史和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影響下的思想史研究。應強調的是，此三者並非英語世界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或主導性取徑，毋寧是吸引越來越多學者投入和嘗試的方向。透過檢視這三個趨勢，本文希望能為對思想史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些觀察和參考，以俾反省、探索思想史研究實踐的各種可能性。

二、全球思想史

思想史研究最顯著的一個趨勢是全球思想史的蓬勃發展。這個現象和世界各地歷史學社群的全球史研究（global history）熱潮密不可分，全球史研究的

³ John W. Burrow,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nglish Academic Life: Reflections on a Revolution," 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0-11.

⁴ 應強調的是，即便同屬英語學術圈，英國與美國（以至加拿大和澳洲）的情況亦有不同。唯此點牽涉太廣，尚待未來進一步分疏。

前景、概念、方法以至潛在問題，也可見於全球思想史的討論。對此，Samuel Moyn 和 Andrew Sartori 於 2013 年編纂、出版了一部論文集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可作為理解全球思想史的概念與實踐的出發點。⁵全書共三部分 13 章。第一部分收錄 1 章，由兩位編者執筆，解析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幾種取徑。第 2 至 11 章為第二部分，結合實例討論全球思想史的方法思考。最後一部分收錄 2 章，旨在重訪全書諸篇，反思全球思想史的潛力和疑難。以下將以第一、三部分的文章為基礎，配合若干學者的研究成果，簡述全球思想史的內涵與重要性。

Samuel Moyn 和 Andrew Sartori 開宗明義指出，全球思想史主要取徑的差異，來自如何概念化「全球」(global)之為物。⁶他們歸納出三種取向：(一)全球作為一個後設分析的範疇(meta-analytical category)、(二)歷史過程的實際空間，以及(三)歷史當事人思考的一個主觀範疇(subjective category)。

第一種取向的核心主張是，思想史探討的對象應該不受地域和時段所限，應在全球的範圍中探究不同的觀念和思想傳統。這個取徑提倡比較史甚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不強調研究對象的連結關係(connected)，因此也適合應用於全球網絡尚未成形的前近代歷史。

此取向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全球的名目下囊括所有地域、文化和時段的思想現象；從歐美主流歷史學、特別是思想史社群來看，這一發展有助打破西方中心論的狹隘立場。我們可以看看 2016 年創刊的英語期刊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宗旨。⁷宗旨強調，思想史能幫助我們理解陌生、與我們不同的人與信念，欣賞不同社會的相異價值(即便和我們自身持存的價值有異甚或扞格)，以及如何解釋這些價值的存在理由。思想史的技藝也可以讓我們認知未來的可

⁵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⁶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Approaches to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3-30.

⁷ 見 "Aims and Scope,"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rgih20> (2017 年 6 月 8 日檢索)。

能性與侷限。這份期刊正是爲了跨越思想史的地理和學科界線，在全球的範圍中倡議這些理想而生，接受比較和跨國視野、從古至今的文章。對西方學術界來說，這可能是振聳發聵之論。不過，擴大思想史的探討對象以至無所不包，其實很難說具備了什麼獨特的全球思想史概念或方法論。

第二種取向是將全球視爲一個連結的整體，旨在探究全球範圍內思想觀念的傳布、交流與互動。Moyn 和 Sartori 認爲相關研究可以從三個角度加以省視。第一個角度強調中介者（intermediaries）在跨越文化、社會、語言、文明或地理界線中扮演的角色。如過去文化交流研究所示，類似做法不一定得仰賴全球史的架構或概念，以中介者個人的經歷、交往爲核心的研究，也可能掩蓋思想觀念互動的許多面向。與此相關，第二個角度聚焦的不是這些中介者本身，而是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媒介，即翻譯角度的研究。重要術語和著作的翻譯和以往接受史的探討有所重合，但焦點已不在輸入方單向的理解或接受，其目標也轉而成爲透過各種形式的翻譯過程，描繪概念流動的全球軌跡。但也有學者認爲翻譯研究多侷限於字詞、語言，主張跨越空間，更廣泛和全面的概念流通及其物質載體，才是全球思想史作爲一個學術領域的基礎和重中之重。⁸

準此，第三個角度可稱之爲網絡（networks）的角度。從網絡角度看，中介者和翻譯仍相當重要，但沒有任何單一要素有想當然耳的決定性地位。學者的核心任務是重建觀念互動過程的整體網絡，分析其建構、傳布和機制。研究者可以通過四處移動的知識掮客（knowledge brokers）來理解概念、傳統或學說的變化，並認知一個網絡是由許多思想、制度和政治要素所打造和限制，從而深刻影響不同文化、地域間的觀念交流。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全球思想史，非常重視不同地區和要素的相互聯繫。儘管十八世紀以前已可見全球不同地域和帝國間的連結關係，以相互聯繫和網絡爲中心的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舞臺，

⁸ 應強調的是，翻譯經常是二種語言間的理解和再呈現，自然有「跨國」（trans-national）的成分。但「跨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視之爲「全球」，其實未有定論，值得進一步細究。另一方面，就翻譯的輸出方而言，其實反映的仍是在地（local）或民族（national）的思想史。承兩位審查人就翻譯和全球思想的關係提出深入疑難，謹此致謝。

可能仍是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世界。無論如何，從網絡出發的全球思想史，在研究對象上不為中介者和翻譯活動所限，也可望為觀念流動、接受和調整的過程，提供更多豐富的歷史解釋。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這類全球思想史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已故英國史家 Christopher Bayly (1945-2015) 的研究。⁹

第三種概念化取向——「全球」作為歷史當事人思考的一個主觀範疇——也催生出關於世界的意識或如何思考全球的思想史研究。相關主題如空間想像、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或世界、世界主義思想 (cosmopolitanism) 等。¹⁰當然，這一取徑和前述二者沒有衝突；研究者可以比較不同時空關於全球的想像，也可以分析在全球的人與觀念網絡中，研究對象的全球意識 (global consciousness) 如何發展、變化。相關作品如 David Armitage 對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際思想」 (international thought) 的討論；¹¹ Arnulf Becker Lorca 關於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國際法形成過程的分析；¹² 及 Cemil Aydin 對十九世紀中葉以至二次大戰後泛伊斯蘭 (Pan-Islamic) 和泛亞 (Pan-Asian) 思想的研究。¹³

這個取徑帶來值得重視的成果，也刺激學者進一步思考全球思想史的方法論。最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什麼樣的思考內容或方式可以算得上是「全球」？從國際思想或國際法角度切入固然精彩，但這個出發點是建立在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列國體系之上；伊斯蘭世界的觀念也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才形成的。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全球」意識或思考的前提仍是一個既有的「國家」觀念，超

⁹ 特別見 C.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¹⁰ 關於人類如何從全球角度進行思考，簡要回顧可參考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36.

¹¹ David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rmitage 倡議的「國際思想」和全球思想史有異有同，但全球思想史的討論多引之為同道。關於國際思想史的方法視野，可參考《思想史》創刊號的討論，見大衛·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等，〈論壇〉，《思想史》，期 1 (2013 年 9 月)，頁 213-416。

¹² Arnulf Becker Lorca, *Mestizo International Law: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842-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¹³ Cemil Aydin,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越國家藩籬方可謂全球。說到底，關鍵也許不是答案，而是從這些討論中反省「國家」、「全球」等範疇／概念工具，以及考慮不同時空條件中（特別是前近代與近現代的差異）全球或世界思想的可能面貌。

從這部論文集出發，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全球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始於何時？這個問題的癥結仍在我們如何認定「全球」或全球思想史的內涵。Frederick Cooper 即扼要指出，全球思想史研究光譜有兩個端點，其一是「軟性」（soft）的全球版本，即跨越國家、大陸、文化以至時間藩籬，即前述第一種取徑強調的無所不包。前近代歷史所見的區域交流、擬全球化現象和世界主義尤其值得注意。另一個端點是「硬性」（hard）的，強調全球思想史應聚焦真正瀰漫於整個世界的觀念，或關注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的諸般觀點。據此，十九世紀以前並沒有嚴格意義的全球思想史。¹⁴無論如何，學者多半同意全球視角更適合十九世紀以降的思想史研究，可呼應近現代歷史的全球化和現代化趨勢。但全球化或人與觀念的交流，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程度、形式的表現與結果。¹⁵思想史家應從不同歷史當事人的觀念和主張著手，細緻地探究全球範圍內思想現象流動、轉化的歷史過程。若然，全球思想史當可培養真正全球性的視野，並為理解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運作機制和侷限，提供新的洞見。

論文集第 13 章由 Sudipta Kaviraj 撰寫，簡扼評述論文集各章要旨，並提出許多甚值參考的觀點和提示。¹⁶如「連結歷史」（“connected history”）畢竟不同於「比較歷史」，後者和以還原語言、探索意圖的思想史取徑並不相侔。在考慮現代世界的全球性規範如何形成時，非西方知識分子其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全球思想史的寫作，不應再環繞西方觀念如何影響非西方世界，而該更有意識地將其視作一種翻譯過程。同樣地，全球思想史也不能僅關注西方思想觀

¹⁴ Frederick Cooper, “How Global Do We Want Our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Be?”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283-288.

¹⁵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Approaches to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20-24.

¹⁶ Sudipta Kaviraj,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Meanings and Methods,”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295-319.

念何處去、發揮什麼作用。我們也應具備不同的「全球性」(globality)概念。思想史的形式不限於文本閱讀，思想與社會(如地位和利益)的關係以及推動觀念流通的動力，也是全球思想史題中應有之義。最重要的是，思想史研究有多少種技藝，全球思想史就有多少種可能性。

由上可知，在蓬勃發展的同時，全球思想史在方法與取徑上仍有許多可討論的空間。對此，Emma Rothschild 的反思仍值得重視。她早在 2006 年便撰文討論跨國的思想史寫作常見的四個陷阱，包括將觀念實體化(reification)、對經濟脈絡(context)的考慮不足、以今釋古(presentism)、以及如何加入階級(class)要素。¹⁷這些問題當然是思想史研究皆須面對的，但全球思想史的跨地域和跨文化格局，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及它與全球化和現代世界的關係等特質，都讓這些問題更加明顯、棘手。廣義而論，全球思想史必須謹慎以對的，是複數的複雜脈絡，這亦是前述「網絡」角度的全球思想史所致意的，需透過更多方法思考和具體實踐加以闡明。要言之，對歷史、特別近現代史來說，全球思想史可望作為一個重要組成，持續為全球史和思想史研究做出貢獻。

三、知性實踐的文化史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趨勢是思想史與文化史的互動，或以 Peter Burke 的話來說，知性實踐的文化史研究，¹⁸以擴大思想史研究對象，囊括非經典文本和非菁英的觀念。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異同離合絕非新課題，但近年確實可見更多較集中、反思性的討論。和此課題有密切關係者，一個自然是文化史本身的發展，另一個則是較少為人提及的學術史(history of scholarship)研究傳統。

¹⁷ Emma Rothschild, "Arcs of Ide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Gunilla Budde, Sebastian Conrad, and Oliver Janz, eds., *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 Themen, Tendenzen und Theor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pp. 217-226.

¹⁸ Peter Burk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n Overview,"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Madrid: McGraw Hill Interamericana de España, 2011), pp. 103-128.

嚴格來說，西方世界的學術史研究雖夙有傳統，廣義而論可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文獻和器物的研究，但作為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其界定和範圍卻頗為模糊。簡言之，學術史是以歷史上廣義的學者及其著述和相關知識實踐為研究對象。綜觀當代（二十世紀）的歐洲學術史研究，外部（external）因素、學術作品內容和作品生產模式，都是重要的題中之義。¹⁹美國學界較流行的「學科史」（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也和學術史有所重疊。²⁰有學者則指出，學術史可謂近期思想史研究中蓬勃發展的一個領域，對理解歷史書寫和藝術面向的貢獻尤大。²¹

在二十世紀，歐洲學術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者當屬 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Momigliano 受古典學訓練出身，極為淵博，特別對古往今來西方世界的歷史撰述和理念有廣泛、精到的見解。²²他關於西方傳統中尚古（antiquarian）理念及其實踐的重視和闡發，影響力至今不衰。如前所述，歷史書寫（或廣義的史學史）是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二十世紀後半以降，最有影響力的學術史家則推 Anthony Grafton。Grafton 受教於 Momigliano，研究主題相當開闊，除了史學史，還廣泛涉及歐洲近世的學者生平與著述、人文主義、語文學（philology）與文本整理、知識環境、科學史等，²³也較早把社會

¹⁹ 精扼的回顧，參考 Christopher Ligota and Jean-Louis Quantin, "Introduction," in C.R. Ligota and J.-L. Quantin, eds., *History of Scholarship: A Se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Held Annually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3.

²⁰ Suzanne Marchand, "Has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 Had its Day?,"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1-152.

²¹ Brian You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cism in Post-War England," 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21; 32-33.

²² 相關著述甚夥，可先參考 Arnaldo Momigliano, *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²³ 可參考兩部論文集以得其大概：Anthony Grafton, *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thony Grafton,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Past as Reve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史視野帶進學術史（教育）中。²⁴這些學者及其著述未必以思想史或文化史自居，但對二者都有很大貢獻，也為知性實踐的文化史提供大量養分。

文化史或文化轉向對思想史研究的衝擊已非一朝一夕之事。Donald Kelley 曾為文討論思想史與文化史的關係，認為二者之別異，反映西方傳統對如何理解觀念的「內在」（internalist）與「外在」（externalist）取徑之爭。Kelley 強調，思想史包羅甚廣，從個別思想人物到集體心態，從觀念和語言內容到外在環境皆是其研究對象。準此，文化史可說是思想史的表顯，思想史則是文化史的內裡；二者互為表裡。²⁵Brian Cowan 則從史學趨勢的角度，顯示思想史與文化史的互動，其實是思想史與其他領域長期對話的一個近期發展。他認為二十世紀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關鍵是強調脈絡，並為讀者提供一條從「文本」（textual）到「社會」（social）再到「文化」（cultural）的脈絡變遷線索。²⁶無論如何，這二位思想史家都沒有在思想史與文化史間建造壁壘，而是著重於思想史可以從文化史中獲得什麼。

準此，對思想史研究來說，文化史浸潤的關鍵影響，不是取彼而代之的典範轉移，而是啟發思想史家進一步擴充脈絡的意涵與範圍。重點並非設法求存甚或對抗，而是要試圖打通二者。

有鑑於此趨勢，Peter Burke 撰文提出了「知性實踐的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一詞，以凸顯相關研究的特色與貢獻。Burke 指出，引領知性實踐文化史趨勢的是科學史家；過去幾十年有重要貢獻的科學史研究，多聚焦於科學實踐及其如何可能的各種環境因素，即探討「各種科學文化」（cultures of science）。這個關懷也延伸至其他領域，包含宗教、政治、歷史書寫、旅遊和地理知識等。另一個值得特別強調的發展，是反省「傳統」

²⁴ Anthony Grafton & Lisa Jardine, *From Humanism to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特別是 pp. xi-xvi.

²⁵ Donald R. Kelley,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5:2 (April 2002), pp. 1-19.

²⁶ Brian Cowan,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deas in Context," 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171-188.

(tradition) 的概念，並由此探究知識生成與傳遞的外緣因素和過程。對此，書籍史、閱讀史和學習活動（如教學、聽講、做筆記等），以至國家如何管理資訊的研究，都做出了顯著貢獻。此外，觀念如何流動也益受重視，催生許多有關翻譯過程和接受史的探討。要言之，知性實踐文化史頗受文化人類學和物質文化史影響，可與新文化史學者如 Natalie Zemon Davis 和年鑑學派第四代學者如 Roger Chartier 的研究互相發明，著重於「實踐」(practices) 及其社會文化環境。

對思想史而言，知識實踐文化史帶來的最大啓發與貢獻，應該是有助於更全面理解歷史時空中的知識 (knowledge)。無論科學史或閱讀史，其實都與何謂知識及其生產、流通和接受有關。知識的角度，也或多或少舒緩過往對思想史的批評，即只重視精英及其文本的不足。就知識的歷史而言，上層與下層或精英與大眾的分野仍然存在，但重點已經轉移至知識實踐的各種面向；上述分野則可謂探討知識實踐時的不同脈絡。

Burke 本人也相當重視知識的歷史。他於 2000 年出版了《知識社會史》專著，描繪自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1398-1468) 以至狄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 的知識與其社會環境的關係，並於 2012 年出版續作，進一步將探討範圍從十八世紀延伸至二十一世紀。²⁷二書在許多面向上一脈相承，如著重知識的社會環境及過程而非內容、強調知識的複數型態 (knowledges)，以及從歷史的角度跨越既有學科藩籬等。有趣的是，時隔十年，Burke 關於取徑的思考似乎有些重心轉移。在 2000 年的第一卷中，他相當重視知識社會學的關懷與成果，並以之為出發點。²⁸但到了 2012 年的第二卷，Burke 並未特別標舉知識社會學的角色，而是強調知識變化的各種過程，自覺地與一般的思想史有所區別，並說明其書亦可視作「知識的政治史」或「知

²⁷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2).

²⁸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pp. 3-11.

識的文化史」。²⁹在長期觀察和研究實踐的基礎上，Burke 也於 2016 年出版一本小冊子，提綱挈領回顧史家與其他學科如何考慮知識史，介紹知識史著述中經常出現的概念，分析知識在歷史時空中經歷的主要過程，並就此領域的問題與展望提供洞見。³⁰

Burke 引述的成果，仍以近代以來歐洲或廣義的西方世界研究為主。但知性實踐文化史的潛力遠過於此。對此，最具代表性的是劍橋大學的羅界 (G.E.R. Lloyd) 教授。他頗致力於比較思想史，特別是古希臘與古代中國的比較研究，著作等身。其比較思想史略可分成二大關懷，一是人類認知 (cognitive) 能力的種種表現，二是不同知識追求的面貌及成因；後者與本節所論尤其相關。羅界曾著書檢視古代世界不同「學科」 (disciplines) 的內涵及其社會環境，³¹近期也以古代探索世界 (inquiry) 的理想為題，透過希臘、印度、中國等個案，從思想史角度討論古代知識活動如何探求、探究什麼、和探索的目標為何等議題。³²經過多年耕耘，羅界的比較視野應可為知性實踐的文化史，增添跨越時段和地域疆界的洞見和參照。

要言之，知性實踐的文化史偏重思想和知識活動的各種環境，特別是文本或觀念以外的要素。此取徑著重考察社會文化脈絡，有時難免輕忽甚至省略一般思想史所仰賴的文本精讀。是故，從事相關探索的學者，或許不認為自己在進行「思想史」研究。這一現象利弊互見。正面的意義在於，這反映吾人探究觀念和知識的取徑益趨多元，不受「思想史」的標籤所限。但另一方面，相關研究者可能有「文化史」的自我認同；最不樂見的結果，是「思想史」家和「文化史」家仍各行其是，罕有溝通。追根究柢，一般印象中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在焦點和處理材料上確實有異，試圖打通二者的同時，仍應為彼此保留

²⁹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pp. 2-4. 不過 Burke 也非常簡短地說，其書仍以社會史 (social history) 為題，是有意提醒讀者留意知識社會學的傳統。

³⁰ Peter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³¹ G.E.R. Lloyd, *Disciplines in the Mak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Elite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³² G.E.R. Lloyd, *The Ideals of Inquiry: An Ancient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空間以求理想的互補效果。最可行的作法，也許是以問題為導向（而非「思想史」或「文化史」的標籤），在歷史時空中的思想觀念活動之大關懷下，根據提問與材料性質，開放地接受、運用所有可行取徑。³³

四、數位人文學與思想史

最後，我想討論數位人文學與思想史研究的關係。數位人文學是一面大纛，將許多概念和實踐收編旗下，不易精確定義。介紹數位人文學的著述，也經常花費不少篇幅探究其定義與內涵。³⁴本文對數位人文學的界定很簡單，即透過電算（computing）技術和數位工具，思考、探索人文學問題的知識實踐（不限於學院或專業學術研究）。對歷史以至思想史研究來說，數位人文學的影響和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史料數位化（digitization）和數位工具的應用。

相對於各種便捷的工具，乍看之下，史料數位化似乎無甚可談，畢竟在進入二十一世紀資訊社會前，學者便已開始建置可供檢索的電子文獻平台。³⁵但我們不能小覷數位化的影響。以「早期英語文獻線上資料庫」（*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EEBO）和「十八世紀經典古籍全文資料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ECCO）為例，它提供絕大便利性，讓研究者可以利用網路遠端利用這些文獻。數位化也大大地提升材料的量：EEBO 收錄了超過 125,000 部，ECCO 收錄超過 180,000 部著述。正是因為材料大量增加，研究者必須透過新方法提問和處理問題，數位工具應運而生。應強調的是，材料數位化和數位工具的發展並非簡單的單向關係。數位化的品質會影響數位工具的操作及其

³³ 近期結合知識史（學術傳統和制度要素）和思想觀念分析的一部傑作，參考 Dmitri Levitin, *Ancient Wisdom in the Age of the New Science: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in England, c. 164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³⁴ 相關討論甚多，扼要的指引，可參考 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and Edward Vanhoutte, eds., *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3).

³⁵ 參考 Roberto A. Busa, "Foreword: Perspective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pp. xvi-xxi.

結果；不足之處將回過頭來，要求我們改善史料數位化過程；改進後的數位材料，則可望進一步刺激研究者修正、開發更適合或有效的研究工具。

管見所及，學界對數位人文學與思想史研究關係的深刻思考並不多。由於「數位思想史」（digital intellectual history）仍是新生且不無疑問的領域，相關討論和實踐多充滿實驗性。以下先介紹幾個運用數位工具研究思想史問題的主要取徑，再試著分析其優缺點與展望。

首先是思想人物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研究。如牛津大學的「知識文化」（*Cultures of Knowledge*）計畫便透過大量通訊紀錄，重構 1550 至 1750 間各種知識人的社群和網絡關係，建置收錄十六至十八世紀飛鴻的「近代早期書信網路平台」（*Early Modern Letters Online, EMLO*），舉辦許多活動並出版相關成果。³⁶與此相似，史丹佛大學的「圖繪文人共和國」（*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也利用通信和旅行足跡，重建近代早期知識社群的社會和物質網絡，視覺化呈現人、觀念和物件的流動。³⁷這類計畫利用數位工具處理大量材料，讓思想史研究憑藉的知識、社會、地理脈絡更加豐富、細緻和複雜化，也有助學者提出新的問題。

此外，這些研究計畫至少有三個共同特質。第一，在大量材料的基礎上，他們都運用視覺化（visualization）工具呈現研究成果，包括社會網絡圖、地理分布圖、以至各種統計圖表。視覺化工具不僅讓研究結果一目了然，也讓讀者在觀看的同時，得以提出新的研究問題。其次，這些計畫仰賴硬體方面的基礎建設，往往需要相當可觀的資源投入，也促成不同研究者以至不同學術單位的合作關係。第三，上述計畫除了已發表的具體成果，也積極開發和改進資料庫與工具平台，鼓勵學者一同參與、利用這些資源開展研究。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取徑，是利用大量詞彙來研究觀念的歷史。最主要的作法是透過關鍵字和詞頻，從資料庫中爬梳這些字詞和用法的變化趨勢。除了如前述介紹的資料平台外，Google 的書籍詞頻統計器（Google Books Ngram

³⁶ http://www.culturesofknowledge.org/?page_id=81（2017年6月8日檢索）。

³⁷ <http://republicofletters.stanford.edu/publications/index.html>（2017年6月8日檢索）。

Viewer) 也是好用的工具，其資訊基礎是涵蓋英文、法文、德文、簡體中文等語言，上百萬本經 Google 掃描、文字辨識的書籍，以圖表呈現搜尋字詞的使用頻率。³⁸

舉例來說，文學研究中的「遙讀」(distant reading) 取徑便和數位人文學密不可分。這個概念由 Franco Moretti 提出，強調與文本保持距離，捨棄傳統的精讀，因為精讀勢必只能施於有限的文本，有限的文本則蘊含一種選擇，即認定哪些文本是經典，值得精讀。Moretti 將文學作品視為可量化處理的資料，利用數位工具分析大量資料，試圖找出統計學上的模式或關係。對他來說，這種不精讀的距離是一種獲致知識的前提，可以幫助我們在文本(一部部著作)之外探索更宏大(如文類或體系)或更精細(如文學手法和橋段)的課題。³⁹ David Armitage 倡議思想史應重拾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探索，也強調數位工具將扮演益發重要的角色。⁴⁰

另一個具實驗性質的代表著作是 Peter de Bolla 的 *The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Human Rights*。⁴¹ 本書運用資料庫，探索十八世紀英語文獻所見的人權概念，並提出關於概念形構(architecture)的反思。作者主要利用 ECCO，透過關鍵字的出現頻率和字詞組合捕捉十八世紀詞彙使用的變化，再嘗試結合歷史事件以解釋變化。本書有兩個重要觀點：第一個是理論層次，強調概念由字詞(包括字詞的使用與搭配)構築，字詞則規定了認知(cognition)和思惟(thinking)的可能性。第二個是歷史解釋，認為直至十八世紀末，普世平等的人權概念仍未出現。

³⁸ 關於 Google 書籍詞頻統計器的發展和應用，可參考 Erez Aiden and Jean-Baptiste Michel, *Uncharted: Big Data as a Lens on Human Culture*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3).

³⁹ 最扼要的說明，見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 2000), pp. 56-58; Franco Moretti,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Verso, 2005), pp. 1-2.

⁴⁰ David Armitage, "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8:4 (December 2012), pp. 493-507, 特別是 pp. 506-507.

⁴¹ Peter de Bolla, *The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但相較於重建社會脈絡，運用數位工具進行歷史解釋的潛在問題更為嚴重。如上述 Peter de Bolla 的著作，雖在方法上有啟發性，但從工具（ECCO 的功能限制）、判讀數據到解釋，待商榷處所在多有。⁴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學者 Marie Leca-Tsiomis 批評用數位工具研究啓蒙運動《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的文章。⁴³起因是幾位學者利用資料庫和數位工具（Vector Space Model 和 Pairwise Alignment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分析《百科全書》和另兩部性質類似、耶穌會士著作的關係，觀察到《百科全書》有大量條目和內容與這兩部書重複，主張《百科全書》與天主教的關係，並不像過去以爲的那樣針鋒相對，啓蒙哲士甚至可說是掠奪者（plunderers）。⁴⁴Marie Leca-Tsiomis 則從材料、前人研究和詮釋等方面檢討這份研究，指出其不足。Leca-Tsiomis 強調，利用數位工具進行研究，首要工作是問對問題，在充分考慮既有成果的基礎上設計程式、改善工具，才有可能持續提出新問題與新發現。⁴⁵

以上述發展和質疑爲基礎，Mark Hill 撰文討論數位人文學與思想史的關係，是第一個包羅較廣、具綜合性的反思。⁴⁶本節開始時說，數位人文學對思想史研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史料數位化和數位工具的應用；Hill 這篇文章也是從這兩方面進行申說。就前者而言，大量數位化文獻提供了更多元的研究潛力。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史家在挑選研究對象時，在方法和問題意識上需要更有自覺。若非如此，思想史也可能會流於堆砌、排比史料。如作者所言，「一個成功的觀念未必一定是更卓越（superior）的觀念……思想史家的旨趣，是

⁴² 參考 Dan Edelste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3:1 (April 2016), pp. 237-246.

⁴³ Marie Leca-Tsiomis,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ow to Study the *Encyclopédi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9:4 (December 2013), pp. 467-476.

⁴⁴ Timothy Allen and others, "Plundering Philosophers: Identifying Sources of the *Encyclopédi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History and Computing* 13:1 (Spring 2010), <https://quod.lib.umich.edu/j/jahc/3310410.0013.107/--plundering-philosophers-identifying-sources?rgn=main;view=fulltext> (2017年4月12日檢索)。

⁴⁵ Marie Leca-Tsiomis,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ow to Study the *Encyclopédi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9:4, p. 468.

⁴⁶ Mark J. Hill, "Invisible Interpret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2 (March 2017), pp. 130-150.

透過觀念自身的歷史向度來理解它們，即這些觀念表達的是什麼，和它們何以可能表達此意」。⁴⁷尤有甚者，數位化本身也難以完美無缺，它們的精確性有賴檢驗，數位化過程也可能喪失文本的物質特性，如尺寸、裝幀、版面等要素隱含的歷史訊息。

Hill 的文章也反思利用數位工具進行思想史研究，特別是歷史意義建構的問題。最核心的問題是，現有的許多軟體、工具，其實並非為思想史研究而設計。在不了解工具運作邏輯的情況下貿然使用，難有令人信服、有價值的結果。其次，純從工具角度思考，也可能讓人忽視既有的研究積累，在解讀所獲結果時——特別是統計數據——產生錯誤推論。此外，數位人文學者經常運用視覺化呈現其發現，但我們必須明白，這些圖形、圖像輸出絕非眼見即為憑，其中牽涉許多和史學方法甚至個人立場有關的要素。最後，技術帶來的又一波計量轉向（quantitative turn），其實是將文本、特別是字詞視為可量化處理的數據，這麼做的一個風險，是只著眼於以工具處理字詞，不顧文字語句的歷史脈絡和背後（編）作者意圖。這顯然與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思想史的關懷與取徑有所扞格。

要言之，數位人文學和思想史研究的關係，仍有許多亟待探索的議題。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清楚認識數位資源和工具的特質與侷限。數位工具的優勢是更有效率地處理龐大、量化性質強的資料，但現有工具在處理思想史課題時往往不盡人意。確實，數位工具在重建觀念和思想人物的社會脈絡上有顯著貢獻，也可為較長時段觀念的發展趨勢提供洞見，但在語言論述分析、作者意圖、意義闡發等面向，仍無法取代「傳統」思想史的技藝，特別是文獻精讀。急功近利、講求產出的風氣可能令人在未深入了解數位工具的情況下便匆匆從事；這可能出現在歷史學門各領域，但對思想史研究的負面影響將尤其顯著。將文獻和詞語視為可統計、運算的資料並非全然不可行，但對相應的研究工具

⁴⁷ Mark J. Hill, "Invisible Interpret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2, p. 135.

和方法必須有充分理解。自然而然推導出的結論是：思想史家應根據自己的研究問題和材料，妥善地結合精讀與數位工具。

這個結論雖卑之無甚高論，執行上卻有實際的困難。關鍵仍是多數思想史家以至歷史學者的數位技能訓練有限。數位人文學工具開發的趨勢，是依據特定研究需求量身打造適合的工具。但最能理解自身需求的，還是研究者本人。就此而言，理想作法當然是讓歷史學者也盡可能掌握數位技能。⁴⁸思想史研究是否須借重數位工具，端視個人決定，並無高下之分。但可以確定的是，思想史家與數位人文學可有許多互動，如從觀念和思想角度考慮材料的量與研究對象代表性的關係、反省數位環境下文本閱讀的角色等。二十一世紀歷史學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回應數位人文學帶來的機會與挑戰，思想史也可望由其研究關懷出發，透過上述嘗試，參與相關討論並做出貢獻。

五、結語：思想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以上簡要評述了英語世界思想史研究發展中頗值留意的若干取徑。它們並非全無憑藉、橫空出世，但較自覺的方法反思確實是較近期的事。從這個角度看，說這些取徑反映新趨勢，應該仍有幾分道理。但思想史領域之廣、累積著述之豐，絕非單一文章所能具論。除了本文所述者，觀念史的復興和脈絡論思想史的更新也值得持續關注，David Armitage 關於內戰（civil war）觀念的新書即為著例。⁴⁹

本文最後，我想補充兩點。首先，說這些取徑為「新」，並不表示其他思想史實踐便是「舊」甚或「過時」。若要指稱二十世紀主流的思想史研究與寫作，較恰當的詞可能是「經典」。從閱讀文本、重建脈絡和還原意圖等方法和關懷來說，本文討論的幾種取徑，和經典思想史研究的關係可謂血濃於水。全

⁴⁸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07-111.

⁴⁹ David Armitage, *Civil Wars: A History in Idea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7).

球、文化以至數位的思想史，不能取代對來自單一文化／國家的思想著述的精細分析；它們所提供的，是更寬廣的視野和研究實踐的可能性。我們絕不能用有沒有涉足這些「新」取徑來臧否、評價思想史家及其研究。

其次，這些取徑和經典的思想史寫作一樣，都能回饋歷史研究。全球思想史可以闡明近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不同地方的思想觀念和個別人事如何流通、互動。⁵⁰知性實踐的文化史將思想史進一步與社會面向結合，也刺激學者考慮何為知識。透過數位工具研究思想史問題，則可能在更長時段、更大範圍的探討中反省思想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以至數位工具的長處和侷限。如同經典的思想史研究，這幾種取徑也將思想觀念視為人類活動的一個面向，並透過不同視角來描繪、解釋思想活動形成與變化的歷史過程。思想史在關懷和方法考慮上，和廣義的歷史研究並無多大不同。⁵¹

如前所述，英語世界這些新趨勢，對近代史的貢獻尤大，而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特別漢語世界）也頗可與之呼應。以全球思想史來說，早在這個術語或概念流行以前，學者便已從東亞以至全球的角度探究中國近代史中的觀念流動，特別是翻譯和概念的接受、轉化，成果極為豐碩。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青年學者也在全球思想史的視野下，透過更多元的手法描繪、分析中國近代的觀念流動。如陳建守結合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和文化史，考察翻譯、不同知識媒介、個別歷史行為者和社會政治環境，分析近代中國如何接受、挪用和論述「啓蒙運動」的概念，廣度和深度均為前此研究所不及，亦具有豐富的開展潛力。⁵²韓承樺探討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則兼容並包各種主題，如翻譯、知識交流、學科建置、學術實踐、行為者意圖等，呈現二十世紀前期的

⁵⁰ 除了前引著述（特別是 C.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亦可參考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⁵¹ 參考 Joseph M. Levine,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6:2 (April 2005), pp. 189-200.

⁵² 陳建守，〈啓蒙如何運動：近代中國「啓蒙運動」的概念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年6月）。

中國如何看待「社會」，刻劃出近代思想文化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⁵³尤有甚者，二者不僅可謂出色的全球思想史研究，也體現知性實踐文化史的特色及長處。

知性實踐的文化史亦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2012年於臺北舉辦的第四屆漢學會議，便可見不少相關討論。如見諸《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的六篇論文，便展現了中外學界結合傳統學術史與廣袤的宗教、社會（家族）、禮儀、物質脈絡的嘗試。⁵⁴沙培德（Peter Zarrow）與張哲嘉主編之論文集則聚焦近代中國的知識建構，環繞翻譯與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探討十九世紀末以來智識生活的若干面向，以至「西學」如何刺激現代中國的知識觀念與分類。⁵⁵

環繞知識的研究中，閱讀史的表現相當亮眼。如李仁淵結合英語世界閱讀史成果和中國史的材料與研究，從各種層面的閱讀實踐、讀者與讀物的關係和互動過程，以至閱讀活動的社會脈絡等角度，省思中國閱讀史研究的潛力與發展方向。⁵⁶潘光哲的《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以晚清士人如何閱讀、追求「世界知識」以認識寰宇情勢為主題，以閱讀史為基礎並吸納出版史和書籍史成果，透過細緻的個案分析來描繪當時士人的「知識倉庫」，及其涉及的諸般知識、社會與文化要素。⁵⁷和潘著相映成趣的是張仲民的近著《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⁵⁸張著最值稱道之處，是關注「不那麼精英的社會階層乃至普通大眾的閱讀實踐與有關的受眾接受情

⁵³ 韓承樞，〈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1890-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年6月）。

⁵⁴ 呂妙芬主編，《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⁵⁵ 沙培德（Peter Zarrow）、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⁵⁶ 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13-254。

⁵⁷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⁵⁸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況」，擴大材料範圍以進一步利用「通俗性的文學性材料乃至各種各樣的商業報刊資料、日記資料」，亦即特別重視「各種媒介」和「接受層面」。⁵⁹無論著重士人或大眾，潘光哲和張仲民都透過閱讀的角度，為理解晚清以降的智識生活、知識生產，以至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參照。

最後，在運用數位工具研究思想史上，漢語世界亦不落人後。最重要的是金觀濤、劉青峰、劉昭麟、鄭文惠等人利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專業數據庫（1830-1930）」進行的探索。⁶⁰其研究主要結合關鍵詞與各種篩選和統計工具，在極大量的材料中找出顯著的詞彙以至觀念現象，再加以分析，成果已相當豐碩，此不贅述。值得強調的是，他們也經常透過研究實踐以至實驗，檢測如何應用數位人文學工具，並思考觀念史研究的進路。以前者而論，這幾位學者討論過諸如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⁶¹「共現」詞頻分析、⁶²統計偏離值等議題；⁶³關於後者，他們也考慮了數位人文如何增益過往的觀念史和概念史取徑，⁶⁴也提出詞彙分析所見的「互斥概念」現象。⁶⁵利用數位人文工具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已讓此領域更加開闊、豐富，也更具挑戰性。

以上提到的研究，只是既有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但這個非常有限的勾勒，應足以揭示思想史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重要性，以及近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

⁵⁹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頁 6-7。

⁶⁰ 關於此平台，見劉青峰，〈觀念史研究與數據庫的建立和應用〉，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63-81。

⁶¹ 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61-82。

⁶²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要義》，頁 141-170。

⁶³ 金觀濤、梁穎誼、姚育松、劉昭麟，〈統計偏離值分析於人文研究上的應用——以《新青年》為例〉，《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6（2014 年 6 月），頁 327-366。

⁶⁴ 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2011 年 12 月），頁 55-84。

⁶⁵ 鄭文惠、邱偉雲、劉昭麟、林書佑，〈概念關係的數位人文研究——以《新青年》中的「世界」觀念為考察核心〉，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57-101。

述，實可與英語世界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趨勢對話。本文的引介與評議，或可為中、外思想史研究的對話，提供一些共同概念與語言，讓此過程更有效率和收獲。唯最有效和可能產生影響的互動，仍仰賴具體經驗研究的交流。無論如何，吾人應盡可能朝此目標邁進；我們的種種嘗試與努力，也可能成為將來知性實踐文化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主題，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留下足跡。

徵引書目

一、專著

- 呂妙芬主編，《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 沙培德（Peter Zarrow）、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 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4。
- Aiden, Erez, and Jean-Baptiste Michel. *Uncharted: Big Data as a Lens on Human Culture*.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3.
- Armitage, David. *Civil Wars: A History in Idea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7.
- Armitage, David.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Armitage, Davi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Aydin, Cemil.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ayly, C.A.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Burke, Peter.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I: From the Encyclopédie to Wikipedi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2.
- Burke, Peter.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0.
- Burke, Pete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 Conrad, Sebastian.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De Bolla, Peter. *The Architecture of Concept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 Grafton, Anthony, and Lisa Jardine. *From Humanism to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rafton, Anthony.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Past as Reve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Grafton, Anthony. *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uldi, Jo,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Levitin, Dmitri. *Ancient Wisdom in the Age of the New Science: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in England, c. 164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Ligota, C.R., and J.-L. Quantin, eds. *History of Scholarship: A Se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Held Annually at the Warburg Institu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loyd, G.E.R. *Disciplines in the Mak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Elite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loyd, G.E.R. *The Ideals of Inquiry: An Ancient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Lorca, Arnulf Becker. *Mestizo International Law: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842-19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Momigliano, Arnaldo. *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Moretti, Franco.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Verso, 2005.
- Moyn, Samuel,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Terras, Melissa, Julianne Nyhan, and Edward Vanhoutte, eds. *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3.
- Whatmore, Richard.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二、論文

- 大衛·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等, 〈論壇〉, 《思想史》, 期 1, 2013 年 9 月, 頁 213-416。
- 李仁淵, 〈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 實踐、過程、效應〉, 收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 《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頁 213-254。
- 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 〈「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 收入項潔編, 《數位人文要義: 尋找類型與軌跡》,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2, 頁 141-170。
- 金觀濤、梁穎誼、姚育松、劉昭麟, 〈統計偏離值分析於人文研究上的應用——以《新青年》為例〉, 《東亞觀念史集刊》, 期 6, 2014 年 6 月, 頁 327-366。
- 金觀濤、劉青峰, 〈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 《東亞觀念史集刊》, 期 1, 2011 年 12 月, 頁 55-84。
- 陳建守, 〈啓蒙如何運動: 近代中國「啓蒙運動」的概念史〉,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6 年 6 月。

- 劉青峰，〈觀念史研究與數據庫的建立和應用〉，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63-81。
- 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於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要義：尋找類型與軌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61-82。
- 鄭文惠、邱偉雲、劉昭麟、林書佑，〈概念關係的數位人文研究——以《新青年》中的「世界」觀念為考察核心〉，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57-101。
- 韓承樺，〈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1890-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年6月。
- Armitage, David. "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8:4 (December 2012), pp. 493-507.
- Burke, Pete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n Overview."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Madrid: McGraw Hill Interamericana de España, 2011, pp. 103-128.
- Burrow, John W.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nglish Academic Life: Reflections on a Revolution." 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8-24.
- Busa, Roberto A. "Foreword: Perspective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pp. xvi-xxi.
- Cooper, Frederick. "How Global Do We Want Our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Be?."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83-294.
- Cowan, Brian.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deas in Context." 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71-188.
- Edelstein, D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3:1 (April 2016), pp. 237-246.
- Hill, Mark J. "Invisible Interpret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2 (March 2017), pp. 130-150.
- Kaviraj, Sudipt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Meanings and Methods."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95-319.
- Kelley, Donald R.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5:2 (April 2002), pp. 1-19.

- Leca-Tsiomis, Marie.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ow to Study the *Encyclopédi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9:4 (December 2013), pp. 467-476.
- Marchand, Suzanne. "Has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 Had its Day?"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1-152.
-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 2000), pp. 54-68.
- Moyn, Samuel, and Andrew Sartori, "Approaches to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30.
- Rothschild, Emma. "Arcs of Ide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Gunilla Budde, Sebastian Conrad, and Oliver Janz, eds., *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 Themen, Tendenzen und Theor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pp. 217-226.
- Young, Br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smus* in Post-War England." In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6, pp. 19-35.

三、網路資源

- "Aims and Scope,"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rgih20> (2017年6月8日檢索)。
- "Cultures of Knowledge," http://www.culturesofknowledge.org/?page_id=81 (2017年6月8日檢索)。
- "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http://republicofletters.stanford.edu/publications/index.html> (2017年6月8日檢索)。
- Allen, Timothy, and others. "Plundering Philosophers: Identifying Sources of the *Encyclopédi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History and Computing* 13:1 (Spring 2010), <https://quod.lib.umich.edu/j/jahc/3310410.0013.107/--plundering-philosophers-identifying-sources?rgn=main;view=fulltext> (2017年4月12日檢索)。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Modern History: Recent Trends in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Fu Y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rveys recent practices of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and identifies some notable trends, including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ools i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t also briefly discusses ways in which such scholarship ma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history, and suggests that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hinese academia as recently practiced has much to offer for cross-cultural conversations.

Keywords: intellectual history, glob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intellectual practices, digital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Center for Digital Cultures